

## “九·一八”事变期间英国的远东政策

汪 文 军

“九·一八”事变是30年代发生的第一次重大的国际政治危机。日本的侵略扩张不仅危及着中国的生存,也威胁着其他国家在远东的利益。当时英国在远东拥有最大利益,它又是国际联盟的实际操纵者和远东华盛顿体系的缔造者之一,其远东政策势必对远东国际局势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史学界一直比较忽视英国的远东政策,而只注重它的欧洲政策,常常简单地认为,30年代英国在远东只是美国政策的追随者。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本文将对“九·一八”事变期间英国的远东政策作初步探讨。

### 一

进入20世纪,远东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重要地区,其中重点是对中国的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企图独占中国。在战后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英美列强联合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让步,并构筑了维护中国和远东现状的帝国主义华盛顿体系。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重新激化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它们在远东的争夺。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随着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整个世界局势开始由20年代的相对稳定向30年代的危机、动荡和战争的方向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开始了衰落的历史进程,经济上沦为美国的债务国,军事上被迫放弃了长期奉行的海军实力“双强标准”。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奉行维持现状、避战求和的外交方针。在远东,维护华盛顿体系确立的中国和远东的现状是20—30年代英国远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独占中国、称霸远东整个扩张计划的第一步,是对华盛顿体系的第一次重大的挑战。面对这种新形势,英国开始推行新的远东政策。对付日本的侵略扩张是这一时期英国远东政策的中心任务。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英国持一种殖民主义的立场。英国也是一个多次侵略过中国的殖民主义国家,在参与争夺和瓜分中国的过程中,它曾默认日本提出的“满州是日本的生命线”的强盗逻辑。20年代,中国人民高涨的反帝斗争沉重打击了英国在华的殖民利益,致使它在30年代以敌视中国人民的立场看待“九·一八”事变。它认为,“中国人不断地破坏日本的地位”是事变发生的主要原因,日本发动事变“旨在迫使中国政府解决许多在满州长期存在的争端”<sup>①</sup>。这种反动立场妨碍了英国对局势作出清醒的估计,使它对日本的侵略行动持同情态度。

英国还认为,中国东北的局势一直比较混乱,南京政府未能行使有效的统治,日本人占领东北或许会有利于局势稳定。英国当权者中一部分人甚至认为,由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可以阻止苏联共产主义向东亚扩张。当时英国陆军元帅威廉·伯德伍德就认为,日本“在满州充分确立其地位,意味着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扩张的真正封锁”<sup>②</sup>。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英国驻日本大使林德利认为,“日本在满州的行动显然可能有利于英国在华的利益”<sup>③</sup>。不过,这种看法只是英国政府中少数人在事变初期所持的一种狭隘的观点,对英国的远东政策不具有支配的地位。

同时,英国也意识到,日本行动本身是违反九国公约、国联盟约和巴黎非战公约的,是与英国维护远东现状的外交方针背道而驰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会破坏华盛顿体系,损害国际联盟的形象,进而危害英国在战后积极参与构筑的以国际联盟为轴心、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巴黎非战公约为支架的帝国主义和平体系。因此,从全局的观点看,日本的扩张行动显然不符合英国利益。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对此指出:“从后果看,我们战后构造的整个和平结构面临着危险,……如果现在国联机构和凯洛格公约失去作用,我认为它们及其缔造者将遭受挫折,其程度是难以预料的”<sup>④</sup>。

此外,英国在华的利益也是制约其远东政策的重要因素。当时的英国,为了恢复其经济实力,需要开辟更大的国外市场。虽然中英贸易的数额不大,但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对英国有很大的吸引力<sup>⑤</sup>。英国在20年代对华推行炮舰政策失败后,从20年代末起,转向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以便为对华经济扩张提供政治保障。事变发生后,英国在推行其远东政策时,坚持注意避免引起中国人民对英国的敌视,从而使它不敢在姑息日本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英国外交大臣西蒙说:“除了安抚日本外,我们确实不能走得更远,……毕竟英国与4亿中国人的贸易将会由于中国的联合抵制而面临危险”<sup>⑥</sup>。英国还担心,如果听任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会引起整个中国的政局动荡。兰普森指出:“如果国际联盟不缓和危机,南京政府将失信于民,……可能发生排外行动,混乱可能接踵而至”<sup>⑦</sup>。在英国看来,如果出现这种局面,不仅会危害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还可能给共产主义势力或日本势力向中国扩张以可乘之机,那就会破坏由华盛顿体系确立的中国和远东的现状,危及英国在整个远东的利益。

因此,英国尽管对日本发动事变持同情态度,但也意识到,只有平息事变,保持中国和远东局势的稳定,才更符合英国在远东的利益。

要平息事变,英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呢?影响英国远东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由于英国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上,而不是站在自身在远东利益受到日本挑战的立场上看待日本的行动,因此对日本侵略扩张的危险性估计不足。这是事变初期英国反应迟钝和同情日本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英国远东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当时英国在全世界坚持避战求和的外交方针。因此它在推行其远东政策时,更不会为了与它直接利害关系不大的中国东北而去冒与日本交战的风险。而事实上,英国的远东军事实力也很弱。早在1919年,英国就意识到“对英帝国东部的潜在威胁将来自日本”<sup>⑧</sup>。为此,英国制定了远东防务计划,其核心是在新加坡修建海军基地,建成基地后派一支主舰队到远东。但到30年代初,这一计划远远没有完成。1931年8月31日,英内阁就远东防务作出如下结论:“如果爆发大的战争,海军将无力完成其任务”<sup>⑨</sup>。这种状况使英国非常害怕与日发生军事冲突,因而不敢采取强硬的远东政策。

其三,英国参与构造的标榜维护战后和平的和平体系——国际联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巴黎非战公约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充满着尖锐的矛盾。30年代初,美、苏两个大国仍

然置身国联之外，这虽然有利于英国控制国联，但也削弱了国联的力量。当时，如果国联作出制裁日本的决议，将主要由英国来实施；如果日本报复，英国就会首当其冲。英国保守党领袖“尔温指出：“由于俄国和美国都在国联之外，对日本实行制裁是一种错误”<sup>⑩</sup>。在华盛顿体系中，英国与美国矛盾重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向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发起全面冲击。20—30年代，英美之间的矛盾斗争十分尖锐。“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英国一方面意识到，只有美国采取强硬政策，才能遏制日本的扩张<sup>⑪</sup>；但另一方面又不相信美国会采取强硬政策（美国也的确没有这样做）。英国驻美大使林赛向伦敦报告说，对日本进行制裁的行动“将与美国的立场完全相反”<sup>⑫</sup>。不仅如此，英国还非常担心美国会把自己推上与日本交战的道路而从中渔利。英国外交大臣西蒙指出：“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我们与他们（指美国）一起行动，他们会让我们打头阵，首当其冲”<sup>⑬</sup>。国际联盟存在的缺陷和英美之间尖锐的矛盾，是英国不愿对日本扩张采取遏制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当时英国国内高涨的和平主义运动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影响英国远东政策的重要因素。30年代初和平主义运动在英国有很大发展，许多政治家都参加了这种运动，许多政党也采取了和平主义路线。英国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政府采取任何可能引起战争的外交政策。“对于绝大多数英国人来说，维护和平主义意味着避免任何导致战争的政策”<sup>⑭</sup>。这也就意味着要求英国政府在谋求平息远东危机时采取和解政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英国的经济危机正达到高潮。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急剧下降<sup>⑮</sup>，失业人数猛增，工人运动高涨。受危机影响，1931年9月15日，英国大西洋舰队的因佛戈登水兵爆发了起义。9月21日英国被迫放弃了金本位。9月20日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谈到经济危机时说：“我们陷入了可怕的困境，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考虑”<sup>⑯</sup>。此时，当务之急是对付经济危机，在外交上则是“希望避免麻烦”。这就削弱了它在30年代第一次重大国际政治危机发生时的应变能力。当时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指出：“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在财政和经济上比军事上更不具备在远东进行一场大的战争的能力”<sup>⑰</sup>。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采取的远东政策是：在避免引起中国人民的敌视和愤怒的前提下，姑息、安抚日本，操纵国际联盟或自己亲自出面在中、日之间进行无原则的调停，以求息事宁人。

## 二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事变，把侵略的爪牙伸向了中国东北地区。

英国在华的利益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在东北的利益微不足道。因此，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对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不构成直接威胁。加上英国对事变持殖民主义立场，对日本侵略扩张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又正处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因而对事变没有作出任何强烈的反应。事变发生后的最初几周，英国没有发表任何谴责日本侵略扩张的声明，没有公开指责日军的行动违背了国际联盟盟约、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更谈不上采取具体行动遏制日本的扩张。这时，它还没有制定明确的新的远东政策，只是让国际联盟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英国对事变的这种消极反应，实质上是对日本侵略行动的一种姑息。这种态度也影响到它操纵的国际联盟。1931年9月下旬，国际联盟应中国的请求，几次举行理事会议讨论东北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也没有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任何谴责，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同时向中、日双方呼吁停止冲突、撤退军队、迅速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从而把

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置于同等的地位。直到1931年10月8日,日军轰炸锦州,企图向关内进犯,才使英国感到有些不安。10月24日,英国操纵国联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之前把军队撤回到事变前的区域内,因遭到日本否决,该决议没有法律效力,对日本没有约束力。

日本的侵略行为和对国联理事会10月24日决议的否决,引起了国联许多中小成员国的愤慨,它们要求依据国联盟约制裁日本。这种动向却引起了英国的不安。直到这时,英国才认真地分析了远东局势,初步明确了它的远东政策。1931年11月11日,英国政府作出抉择:英国的远东政策“应该是一种和解政策”。外交大臣西蒙对此作了具体的解释:“政策——对日和解。对中国——……不要寻求援引盟约第16条。对日本——我们不想实行制裁”<sup>⑮</sup>。随后,英国采取各种措施阻止国联通过制裁日本的决议。在日内瓦,英国向国联各成员国表明英国反对实行制裁的立场,同时对国联封锁消息,没有按国联决议的要求把获得的情报(主要是对日本不利的情报)提交给国联。此外,还阻止中国援引关于对侵略者实行制裁的国联盟约第16条。11月11日的英国内阁会议明确决定:“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中国呼吁从援引第11条转到第16条”<sup>⑯</sup>。随后,英国外交代表按这一方针开展活动,阻止了中国援引国联盟约第16条。国联始终没有作出制裁日本的决议。

11月下旬,日军已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日本要求国联派调查团到东北“调查”。本来在事变刚发生时,中国代表曾提出过这种要求,但遭到日本反对,英国也就拒绝了。现在日本再提这种建议,旨在阻止国联通过制裁它的决议,拖延时间,以造成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英国在既不能促成日本撤军,又不敢制裁日本的情况下,接受了日本的建议。在英国的操纵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了派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的决议。可见,这一举动完全是英国姑息日本侵略活动的结果。连英国《泰晤士报》也承认,“调查团将挽救不了中国。或许只是企图由此挽救国联的面子”<sup>⑰</sup>。

1932年1月3日,日军侵占了锦州。然而英国满足于日本政府答复的在东北继续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保障,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强烈的反应,相反,它对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的“不承认”照会所作的反应,却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日军占领锦州后,深感不安的史汀生于1月7日发出照会,对日军侵略造成的事实“不承认”<sup>⑱</sup>。事先他邀请英国与美国一致行动,而英国不仅拒绝,而且还在1月9日发表公告说:“英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仿照美国照会的方针向日本提出任何照会”<sup>⑲</sup>。这等于是公开向日本表明,英国将不会与美国一起联合对付日本(美国的政策超出本文范围,姑且不论),这对一直担心英美象从前华盛顿会议上那样联合对付自己的日本是一种鼓励。后来英国的许多史学家也认为,英国的这一举动“等于给日本继续在中国为所欲为开绿灯”<sup>⑳</sup>。

1932年1月28日,日军为了转移国际舆论的注意力,掩盖其在中国东北新的侵略活动,在上海制造了新的事端。

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据统计,1931年英国在华投资19796万英镑,其中13000万英镑集中在上海<sup>㉑</sup>。日本在上海的扩张活动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华的利益。此外,日本向不属于它势力范围的上海扩张,使英国开始认清日本制造远东危机的严重性。1932年2月1日,英国外交部官员普拉特分析了远东局势后认为,“如果仍然不制止日本的扩张,英国将不得不从远东全面撤退”<sup>㉒</sup>。因此,英国急于平息日本在上海制造的危机。

为了平息“一·二八”事变,英国改变了前一阶段对日本侵略东北时采取的消极应付的做法,而是积极主动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英国迅速地对“一·二八”事变作出了较强烈反应。1月29日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

照会，表示对上海局势的严重关切。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也向日本领事发出了抗议照会。1月31日，英国决定增派两艘巡洋舰到上海。此外英国派驻上海的官员奉命阻止日本增援部队利用公共租界作登陆据点。英国还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城市周围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

其次，英国加强了与美国的联系，并注意协调两国的政策。英国在采取上述行动时，都主动地邀请美国采取同样行动。美国也积极地响应英国的邀请，采取了与英国同样的行动。这时两国在远东问题上也有分歧，比如当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主张把东北问题与上海问题联系起来，谋求全面解决远东危机。而英国则主张首先解决上海问题，认为东北问题很复杂，史汀生的主张是“拙劣的、不明智的”。英国甚至一度想牺牲中国东北来保障它在上海利益的安全，即“接受满州的溥仪以换取上海的和平”<sup>②6</sup>。但此时它意识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尽可能与美国协调一致”<sup>②7</sup>。因此没有公开向日本表明它与美国的这种分歧。

其三，接受史汀生的“不承认”政策。1932年3月1日，日本策划的伪满州国宣告成立。面对日本这种违反九国公约的行为，英国决定接受曾被它拒绝的“不承认”政策。1932年3月11日，国际联盟特别大会根据英国外交大臣西蒙的提议，通过正式决议，明确指出：“国际联盟会员国的义务是，不承认用违反国际联盟规约或巴黎公约（非战公约一引注）的手段所造成的任何情势、条约或协定”<sup>②8</sup>。

其四，直接出面在中日之间积极进行调停。1月29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就与美国总领事一起在中日之间开始了调停活动。2月12日，兰普森从回国途中赶到上海，全力开展调停活动。最初由于日军态度顽固，无意停火，英国进行的调停没有奏效。直到3月初，抵抗日军的中国守军由于得不到南京政府的切实援助，在多次沉重打击日军后被迫撤退，日军这才同意在上海停火。英国又抓紧时机调停，最终促成中日于1932年5月5日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从被占领的地方撤退了。

上海局势的平息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英美列强的积极干涉也起了一定作用。从英国方面看，为谋求平息上海局势，它在推行其远东政策时明显地变得更加积极和主动，给日本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使它担心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受到英美的联合制裁，不仅不能占领上海，而且会丢掉已经到手的东北地区<sup>②9</sup>。日本政府的这种心态是它决定在上海停火和撤军的原因之一。

然而，“一·二八”事变期间英国远东政策的变化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一，英国的政策仍然是谋求息事宁人的和解政策，而并没有变成遏制日本扩张的强硬政策。在“一·二八”事变期间，英国仍然反对制裁日本，并一再指示其驻上海地区的部队，不得与日军发生冲突，其职责只是协助进行调停活动。当美国提议由英美发表一项维护九国公约的联合声明时，英国因担心日本的报复而拒绝了。其二，英国只是急于谋求平息上海局势，对与它直接利害关系较小的东北则很少关注。它反对把两个地区的问题联系起来一起解决，甚至一度想牺牲中国东北以换取它在上海利益的安全。因此“一·二八”事变期间，英国的远东政策从对上海局部而言是趋向积极、主动了一些，但从对日本侵华的全局来看，则正好满足了日本转移国际舆论的注意力、以便加紧侵略中国东北的需要，使日本得以在东北策划建立伪满洲国。

上海局势稳定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再次成为英国远东政策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虽然东北与英国的直接利害关系不大，但如果听任日本在东北为所欲为，不仅对英国在华的利益是一种潜在威胁，而且也会危害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积极参与构筑的和平体系，从而危害英国的既得利益。此外，如果英国不积极参与谋求平息东北局势，中国及国联的一些中小

成员国也许还会要求国联制裁日本，那将会使英国陷入左右为难的被动地位。因此，上海局势稳定后，英国又转向谋求稳定东北的局势。

如何解决日本侵略东北这个问题呢？英国认为，一方面东北在传统上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一直视它为自己的“生命线”，而且骄横的日本关东军实际上控制了东北，扶持建立了伪满洲国，因此要完全恢复事变前的原状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完全接受日军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不仅会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对，而且还会引起国联广大弱小成员国的不满，削弱战后整个和平体系。为此，英国提出所谓“面对现实”的解决办法，在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东北实行自治，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英国外交部对此解释说：“在纯司法的基础上找不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抛开理论上的主权而面对现实”<sup>③0</sup>。

按照“面对现实”的方针，首先要取消伪满洲国。伪满洲国刚成立时，日本还没有在外交上正式“承认”它。于是，英国竭力劝阻日本“承认”伪满。然而，日本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它在获悉李顿调查团写完了调查报告后，于1932年9月15日“承认”了伪满洲国。

英国还把李顿调查团的活动纳入自己的政策轨道。在确定了“面对现实”的解决办法后，英国指示驻华公使兰普森，把这种主张转告调查团。在英国操纵下，调查团的活动完全纳入了英国政策的轨道，写成的调查报告贯穿着英国“面对现实”的思想：一方面把事变发生的主要责任推到中国头上，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又指出，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满洲国”是不合法的；最后还提出建议：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恢复原状，而是东北实行自治，维护日本在东北的利益<sup>③1</sup>。

随后，英国操纵国联以调查团的报告书为依据进行调停活动。当时中国腐败的南京政府表示接受国联的这种调停，而在扩张道路上一意孤行的日本则反对李顿报告书。1932年11月21日，国联理事会开始就日本侵略东北问题进行辩论。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在发言中为日军的侵略行动多方辩护。他强调说，日军在东北的行动与过去英国在华的一些行动——如1927年制造的南京惨案在原则上如出一辙。面对这种反唇相讥，出席会议的英国外交大臣没有进行任何反驳，相反在发言中专门强调李顿报告书中指责中国的段落，强调事变发生的责任在中国，并表示英国反对制裁日本。然而，无论英国怎样向日本献媚讨好，也没有使日本放弃侵略政策。日本依然坚持维护“满洲国”，并扬言，如果国联不承认“满洲国”，它就退出国联。与此同时，日军在中国开始了新的扩张活动，于1933年1月占领了山海关，并开始向热河地区进攻。日军的炮火粉碎了英国“面对现实”解决日军侵略中国东北问题的企图。

这时，英国在是否承认“满洲国”问题上面临着两种选择：如果不承认“满洲国”，日本很可能退出国联，在侵略扩张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如果承认“满洲国”，则等于公开支持日本的侵略扩张和对一系列国际条约的践踏，势必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这时英国认为，“与其使国联丧失尊严和原则而让日本留下来，倒不如让它退出更好一些”<sup>③2</sup>。因此，英国选择了不承认伪满洲国。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指出：“满洲”的主权属于中国，任何国家不应侵犯中国的领土完整。对于违反国联盟约和九国公约而建立的“满洲国”，国联成员国不得在法律或事实上表示承认。

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不久，日军侵占了中国的热河地区。1933年5月31日，日本迫使中国南京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至此，日军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和热河地区的侵占活动。这一时期英国的远东政策以失败而告终。

### 三

综上所述,我们或许可以得出如下看法:

第一,“九·一八”事变期间,对付日本的侵略扩张是英国远东政策面临的中心任务。对此,英国采取了软弱的和解政策,同情和姑息日本的侵略活动,还企图以东北“自治”这种牺牲中国利益的办法满足日本的扩张欲望。因而,英国的政策实质上是绥靖政策。这就表明,30年代英国的绥靖政策首先是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在远东对日本推行的,而不是象一般人认为的在1933年后才在欧洲对德国推行,更不是象有些国外学者所说的,“绥靖……从没有真正试图对日本推行”<sup>③③</sup>。但另一方面,英国这时的远东政策还没有发展到后来与德国签订《慕尼黑协定》的那种程度,英国最终毕竟没有承认“满洲国”,这与它后来的欧洲政策是有所不同的。

第二,英国远东政策的消极影响是很明显的。在这一阶段,英国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没有采取任何强硬的反击行动,而且同情、姑息和讨好日本,进行无原则的调停,从而暴露了它自身及其构筑的和平体系的虚弱本质,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扩张活动。另外,英国不仅不积极支持中国对日本的抵抗,反而压制中国要求制裁日本的主张,并公开拒绝美国的某些积极倡议,从而妨碍了各国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满足了日本分化国际力量的扩张要求,使受日本侵略和威胁的各国丧失了制止日本扩张的最好时机。此外,英国政策的软弱性和对日妥协性及其最终失败的结局,使中国南京政府依靠西方列强和国际联盟制止日本侵略扩张的希望破灭,从而促使它于1933年初由过去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进一步转向与日本谋求妥协的政策。

第三,30年代英国主要是依据它自己的判断和自身的利益独立地制定和推行其远东政策的,至少在30年代初期是这样。英国的远东政策是影响远东国际局势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在研究30年代远东国际关系史时,不应该忽视英国的远东政策。

注释:

①②⑥⑨⑫⑬⑭⑯⑰⑱⑲⑳ 克里斯托弗·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制》,麦克米伦公司1973年版,第143、177、264、71、186、90、267、177、251、362页。

③④⑦ 巴特莱等:《1919—1939年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2辑第8卷,伦敦1960年版,第509、603、603号。

⑤ 弗里德曼:《1931—1939年中英关系》,纽约1940年版,第6—9页;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牛津1977年版,第1页。

⑧ 保罗·哈格:《困境中的英国——1931—1941年对付日本、保卫英帝国》,牛津1981年版,第1页。

⑩⑪ 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一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中译版,第330、331页。

⑬ 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1936—1939年绥靖政策》,牛津1981年版,第20页。

⑭ 梅德利科特:《凡尔赛和约以来的英国外交政策》,伦敦1940年版,第146页。

⑮ 巴勒:《英国与20世纪的世界事务》,伦敦1971年版,第48页。

⑰⑱ 英国文献局:《英国外交部档案》,编号371 F7596/1391。

⑳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3—214页。

㉑㉒ 斯科菲尔德:《英国海上力量——20世纪的海军政策》,伦敦1967年版,第119页。

㉓ 克里福德:《从中国撤退》,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页。

㉔ 巴特莱等:《1919—1939年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2辑,第9卷,伦敦1965年版,第238号。

㉕ 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版,第633页。

㉖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下,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版,第33页。

㉗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译版,第570页。

㉘ 路易斯:《1919—1939年英国远东战略》,牛津1971年版,第200页。

㉙ 陈绍贤:《中日问题之研究》,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版,第227—230页。

㉚ 威廉·罗克:《30年代英国的绥靖政策》,伦敦1977年版,第2页。